

高校阿拉伯语精读教材文化内容 分析及课程思政教学启示

王晓宇

(复旦大学 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要:外语教材是开展外语课程思政的重要依据和载体,系统梳理教材文化内容是深入挖掘课程思政要素的前提。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和统计检验法,从文化主题、文化层级和国别属性三个层面分析高校阿拉伯语精读教材文化内容呈现特征,由此讨论基于现有教材开展阿语精读课程思政的可行性。通过教学举例,就如何使用现有教材挖掘思政素材,更好实现外语课程思政目标提出几点教学启示。

关键词:阿语精读教材;文化内容;外语课程思政;教学启示

中图分类号:H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1-0161-10

0 引言

高校外语学科的人文属性决定了开展课程思政具有特殊优势,每一门外语专业课程都处于跨文化情境中,不仅从跨文化思辨角度润物无声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和思辨能力,还起到拓展国际视野和坚定文化自信的效果,这是高校外语课程在立德树人方面的独特贡献(孙有中 等,2021:11)。外语教材是开展外语课程思政的重要依据和载体,因其内容中包含对象国价值观念、社会政体、文化风俗等大量知识,为跨文化比较与反思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孙有中,2020:51;徐锦芬,2021:18)。因此,研究教材中文化内容对外语课程思政具有重要意义。

阿拉伯语是22个阿拉伯国家与地区的官方语言,也是联合国工作语言、全球母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之一,被我国列入一级关键外语(杨言洪 等,2018:60)。阿拉伯语专业作为国内外语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为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培养兼具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型外语人才重任,更需要紧跟国家教育方针积极投入到外语课程思政建设

收稿日期:2024-10-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阿贸易提质升级路径研究”(22CGJ0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晓宇,女,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区域国别研究、中阿跨文化研究。

引用格式:王晓宇. 高校阿拉伯语精读教材文化内容分析及课程思政教学启示[J]. 外国语文,2025(1):161-170.

中。国内高校阿拉伯语专业统一使用《新编阿拉伯语》系列教材(以下简称“阿语精读教材”)作为精读课本,该套教材遵照教育部《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为推动贯彻《高等学校阿拉伯语教学大纲》而编写,在国内高校阿语专业教材中承担着引领全局的作用。本研究着眼新时代外语教学育人目标,立足阿语教学实际,分析阿语精读教材的文化内容,探索教材的思政功能,为更好地利用教材有效开展课程思政提供依据。

1 外语教材文化内容分析理据综述

国外学者围绕外语教材文化内容分析提出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评估标准,使用多种分类方法解析、评估教材中的文化内容。按文化类型分类是最常用的分类方法(Liu, 2016: 842),如纳尔逊·布鲁克斯(1968)最早将教材中的文化内容分为“大C”文化(历史、地理、政治、文学、哲学等)和“小c”文化(生活方式、传统习俗、风俗习惯等);迈克尔·拜拉姆(Michael Byram)(1991)将教材中的文化内容划分为社会交往、信仰和行为、社会政治制度、国家历史、国家地理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苏尔坦·阿尔穆贾伊维尔(Sultan Almujaivel)(2018)使用语料库处理方法,将沙特阿拉伯使用的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内容划分为教育、家庭生活、历史和语言等20个文化类型。按目的语文化、本土文化、其他国文化的三分法也十分普遍,马丁·科塔齐(Martin Cortazzi)等(1999)率先主张将教材的文化内容按国别属性分为目的语文化、母语文化和国际文化,提供了考察教材中文化内容的新方法。

国内研究方面,牛新生(2002)把教材中的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社会文化、观念文化等五类;郑晓红(2009)使用价值取向理论,综合教材内容分析框架,将教材中的文化价值取向分为人的本性、人与自然、人际关系三个方面;张伟年(2014)将教材中的文化模式分为科技、政治、自然、文化、社会等五大类;刘艳红等(2015)运用语料库方法,将十套教材中语篇呈现的文化分为内圈英语国家文化、外圈英语国家文化、扩展圈国家文化、共同文化、文化对比和国别不详六类。

综上发现,第一,外语教材文化内容分类方法较多,很难形成统一标准,需要针对具体研究对象采用适当的分类方法;第二,鉴于国内外研究聚焦分析英语教材,在采用现有方法分析非英语教材的文化内容时,有必要加入对其专业特点的实际考量;第三,如何从教材文化内容中挖掘思政元素,有针对性地开展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还需进一步探究。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精读教材共六册,按教学阶段划分,第一、二册为初级阶段课本,第三、四册为中级阶段课本,第五、六册为高级阶段课本。全册教材共有103个学习单元,其中,第一册共有23个单元,前13单元主要包括单词、对话和句型等内容,后十个单元包含课文内容,其余五册每册均有16个单元内容。另外,该套教材中每个单元的题目都以该单元中的课文题目命名,说明课文不仅是阿语精读课的重要讲解内容,其包含的文化内容还代表了该单元的文化主题。据此,本文将《新编阿拉伯语》全套教材中的课文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共计90个单元,具体分析课文内容呈现了哪些文化主题,不同文化内容在各册教材中的区分度如何?文化内容的国别属性分布如何?

2.2 研究依据与方法

不同于普通的课程建设,《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在落实立德树人基本任务上重视价值塑造,强调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融合(教育部,2020),其中,外语课程思政就是要重视价值观的引领,将其与语言知识的传授和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其思政功能集中体现在为塑造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挥积极作用(肖琼等,2020:10;文秋芳,2021:48)。阿语精读教材中文化内容的思政功能可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不同文化主题内容是学生获得由各文化要素传递出的价值观念的基本构件,二是不同国别文化内容为课堂提供多元文化环境,有助于培养学生面对不同价值观问题时的跨文化能力与思辨能力。所以,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按照凝炼主题、划分主题、划分层级三个步骤,对教材中不同的文化主题进行编码,再统计不同文化主题和国别文化在教材中的分布情况,并采用卡方检验分析不同阶段教材中各文化主题的差异情况。

(1) 文化主题分类

第一,凝炼主题。在跨文化外语教学中,文化主题构成了外语教材的主线(张红玲,2007:210)。一篇课文往往涉及多个文化因素,准确凝炼文化主题既是一项教学任务,也是开展教材分析的基础。本研究根据教学大纲及教学目标明确的教学侧重点,结合教材配套的教师用书以及多年教学经验,将教材中每一单元课文所蕴含的文化内容凝炼为一个文化主题,确保文化内容凝炼符合教材编者初衷和教学活动实际。例如,第三册第十一课《阿拉伯语的现状与未来》(واقع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ومستقبلها),重点介绍了阿拉伯语的特有性质,故视为语言主题。又如第三册第十四课《阿拉伯的石油与政治》(البتروال العربي والسياسة),重在讲述石油对阿

拉伯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其主题凝炼为国家社情。

第二,划分主题。从分析文化异同的视角出发,张红玲(2007:274-275)认为一国文化可以细分为文化产物(文学、艺术等)、文化活动(社会交往模式、生活习惯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态度等)三个层面及多个维度。从跨文化能力的影响因素视角出发,语言、态度、思维模式等八个因素影响跨文化交际(Samovar et al., 2000)。潘亚玲(2016:33)按照文化的核心层、中层和表层总结出价值观、社会规范、语言等影响跨文化交际的九大基本因素。为确保文化主题的划分既符合跨文化理论解释,也顺应当前外语专业人才跨文化能力培养需求,本文将教材文化主题划分为语言、交际与行为规范、国家社情(包括风俗、人物、历史、地理等)、文化产物(包括文学、艺术等)、价值观(包括人生观、生活观等)、态度(包括认知、情感等)等六类,依次采用数字符号Ⅰ、Ⅱ、Ⅲ、Ⅳ、Ⅴ、Ⅵ表示。另有两个单元的文化主题不属于上述划分范围,故最终确定88个单元作为研究内容。

第三,划分层级。跨文化交际研究者认为,文化可以分为表层、中间层和核心层三个层级,表层文化是通过感官直接观察到的现象和事物,中间层文化一般指行为规范,而核心层文化是指人对存在的基本假设(潘亚玲,2016:32)。文化是由各文化因素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将文化拆分成文化因素时,应“溯本求源”从文化的表层、中间层和核心层因素全面系统地展开分析,才能避免跨文化比较中的东西方“二元论”模式(潘亚玲,2016:33)。据此,上述六类文化主题可归类为三个文化层级,其中,表层文化内容包括“语言”,中间层包括“交际与行为规范”“国家社情”和“文化产物”,核心层包括“价值观”和“态度”。

(2) 国别文化分类

教材中包含多元文化内容,有利于学生了解中外文化异同,增进学生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包容意识,提高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能力。为考察不同国别文化内容的分布情况,阿语精读教材的文化内容将按其所属国别划分为目的语文化(阿拉伯文化)、母语文化(中国文化)、国际文化(除母语文化、目的语文化之外的文化)三类。

3 研究发现及讨论

3.1 聚焦价值观、国家社情两类文化主题

本研究将88个单元的文化内容按主题、层级进行划分与统计,发现有31个单元属于价值观主题,占比35.23%;22个属于国家社情主题,占比25.00%;15个属于交际与行为规范主题,占比17.05%;九个属于文化产物主题,占比10.22%;六个属于态度主题,占比6.82%;五个属于语言主题,占比5.68%(见表1)。由此可见,精读教材侧重向学生呈现目

的语国家的风土人情、价值观等文化内容。相应地,教材中表层文化、中间层文化、核心层文化单元数分别为 5、46 和 37,反映出教材文化内容不仅涵盖目的语文化中的各层级文化,还注重输入中间层和核心层文化,这既有利于学生全面了解目的语文化概况,也有助于学生深入目的语文化内核,加深学生对目的语文化的认知理解,提升他们的跨文化认知能力。

表 1 不同文化主题单元数量统计结果

文化层级	文化主题	编码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合计
表层	语言	I 类	1	3	1	0	0	0	5
中间层	交际与行为规范	II 类	8	3	2	0	0	2	15
	国家社情	III 类	1	3	5	6	3	4	22
	文化产物	IV 类	0	0	1	1	3	4	9
核心层	价值观	V 类	0	7	7	5	8	4	31
	态度	VI 类	0	0	0	2	2	2	6
合计			10	16	16	14	16	16	88

3.2 各册教材的文化内容有显著区分度

本研究使用卡方检验分析各册教材中文化主题单元数量的差异情况,发现各册教材在文化主题($X^2=66.54,df=25,p=0.000$)和文化层级($X^2=18.23,df=10,p=0.050$)上的单元数量分布情况均存在明显差异(见表 2),说明教材中不同主题的文化内容在编排上具有良好的区分度。

表 2 卡方检验结果(N=88)

内容	检验值	自由度	显著性(双尾)
各册教材中不同文化主题的单元数量	66.54	25	0.000
各册教材中不同文化层级的单元数量	18.23	10	0.050

(1)文化主题分析

教材中不同文化主题单元的数量分布与每册教材的教学任务密切关联。第一册的中心任务是掌握语音和会话交流,强调在打好语音基础的同时掌握阿拉伯语最基本的词汇、句型和交际用语,第二册开始向会话和课文过渡,课文内容偏重家庭、学校和日常生活等内容,紧密联系现实生活经验。因而,初级教学阶段教材内容以 I、II 类文化主题为主,其中 II 类主题内容最多,占比 42.3%。从第三册开始,课文内容已经全部选用阿拉伯语原文材料,课文主题逐渐转向社会、文化、历史、艺术及人生等话题,在课文注释中也增添了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如时代背景、作者简介等),提升了教材的知识性和趣味性,因而中级教学阶段教材中 I 类、II 类主题内容明显减少,III 类主题内容的占比由 15.4%提升到 36.7%,IV

类主题内容少量增加,V类主题的占比由26.9%提升到40.0%。随着教学进入高级阶段,第五、六册教材内容拓展到了阿拉伯国家政论、人物传记、现当代文学等内容,教材中Ⅳ类、Ⅵ类主题内容增加,Ⅲ类主题内容相应减少。

(2)文化层级分析

不同学习阶段决定了教材中的文化层级分布。表层文化主要贯穿于前三册教材;中间层文化中的Ⅱ类主题内容主要分布于前三册,Ⅲ类主题内容贯穿于一到六册,Ⅳ类主题内容主要集中于第五、六册;核心层文化中的Ⅴ类主题内容出现于第二册,在第二至六册中占比较大且分布较为均匀,Ⅵ类主题内容出现于第四册,之后一直保持稳定数量。由此可以发现,第一,教材聚焦中间层文化内容,涉及46个单元,占比52.3%;作为介绍阿拉伯国家社情的Ⅲ类主题内容贯穿始终,体现出教材更加注重输送目的语文化知识。第二,教材逐步增加知识深度。随着教材册数的递进,整体上表层文化内容数量减少,中间层、核心层文化内容的数量逐渐增多,同一主题和层级的文化内容也逐级深入与复杂。如第一册第十四课《问候与相识》(تحيات وتعارف)与第六册第二课《如何与性格不好之人相处》(التعامل مع الشخصيات الصعبة)两个单元,虽然都属于中间层的“交际与行为规范”文化主题,但后者在课文篇幅、翻译难度、思想内涵上都有较大提升。第三,教材注重培养思辨能力。对于理解目的语文化,重要的是理解深层文化(霍尔,1991:32)。教材从第二册起就加入核心层文化内容,到五、六册中的核心层文化内容占比达50%,有利于学生逐步理解深层次文化内涵。

3.3 目的语文化在教材中占据主导地位

教材中有51个单元涉及目的语文化,占比57.95%;六个单元涉及母语文化,占比6.82%,仅出现在第一到三册教材中;31个单元涉及国际文化,占比35.23%,但没有具体的国别属性指向,即没有涉及除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以外的其他国文化。教材这样编写,可能出于两点考虑:一是不同于英语这门世界性语言,阿拉伯语所承载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与国别特色,因而没有涉及其他国文化;二是国内高校阿语专业学生基本都是成年后零基础接触该中东地区语言和文化知识,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母语思维对阿拉伯语学习的干扰,所以母语文化较少(国少华,2011:301)。

3.4 结果分析与讨论

阿语精读教材中价值观和国家社情两类文化主题内容占比较大,目的语文化居多,一方面是教材编者基于当时高校阿语教学实际,为保证学生能够在有限课时内充分了解对象国的风土人情,尽可能多地营造目的语文化氛围;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编者意图将培养阿语

学生正确人生观、世界观的培养目标融入到语言教学中,指引学生在获得语言能力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使学生由表及里、循序渐进地了解目的语各个层级的文化内容,各册教材的文化主题内容在数量分布上差异显著、层级分明,这与阿语专业本科各阶段教学任务紧密相连。总体上,教材通过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对提升学生语言技能、传授学生文化知识及塑造价值观念都大有裨益。

表 3 不同国别文化单元数量统计结果

	目的语文化	母语文化	国际文化	合计
第一册	8	2	0	10
第二册	7	3	6	16
第三册	7	1	8	16
第四册	10	0	4	14
第五册	7	0	9	16
第六册	12	0	4	16
合计 (占比)	51 (57.95%)	6 (6.82%)	31 (35.23%)	88 (100%)

高校外语教材既要从根本上提升对母语文化和目标语深层文化的自觉性(康莉等,2018:70),也要适当涉及世界多元文化(孙有中,2017:865),为课程思政提供素材依托。不可否认,现有阿语精读教材中母语文化占比偏少,存在“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并且缺少国际文化内容,这与当前《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倡的深谙中国国情和坚定文化自信的课程思政理念,以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阿拉伯语专业教学指南》强调的在知识上要中、阿语言文化知识并重,在素质上要突出中国情怀、国际视野的人才培养要求出现脱节。但本文认为,在课程思政背景下阿语精读课教学不必过多纠结该套教材中不同文化内容的呈现比例,其一,课程思政的目标和效果更多由核心层文化体现(陈法春,2020:15-16),阿语精读教材聚焦价值观文化,为课程思政提供了较为扎实的素材基础,阿语教师可立足外语教学的跨文化特点,将教学过程变成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价值取向、文化自信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课程思政过程(孙有中,2020:47);其二,课程思政是一种教学理念,思政内容是弹性的、隐性的(徐锦芬,2021:19)。阿语教师可发挥能动性灵活运用教材,以适合中国国情、坚定中国立场、发扬文化自信为理念,丰富阿语教学的思想性和时代性,实现润物细无声的课程思政效果。

4 教学启示

外语课程思政强调兼顾国际视野和中国情怀,是为了培养学生形成基于跨文化比较和

文化思辨能力的自觉实践能力(王会花等,2021:41),要求学生既要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对不同民族文明、文化传统有深层次的理解,能够进行比较、鉴别、取舍和文明互鉴,也要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更深切的关怀和更深厚的自信(孙有中等,2021:7-9)。

基于精读教材现状,一方面,阿语教师可综合精读课特点以及培养学生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的教学目标,探寻课程的思政内容,通过适当引入中国文化元素,实现专业教学目标和课程思政目标的重合。教师还应注意避免因生硬植入“课程思政”元素而弱化外语教材和课程本身的性质,引发学生的反感(徐锦芬,2021:3)。

以精读教材第四册第六课《纳吉布·马哈福兹与诺贝尔奖》(نجيب محفوظ وجائزة نوبل)为例,课文讲述的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是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阿拉伯作家,其长篇小说《宫间街》《思宫街》和《甘露街》被誉为“三部曲”,通过描写埃及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1919年革命前夜到1952年革命前夕的变迁,侧面反映出埃及社会近半个世纪所发生的深刻巨变。在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上,教师应先厘清课文涉及哪些主题和层级的文化知识,明确培养学生哪几方面能力,如在授课中介绍课文中涉及的作者人物生平及其获得诺奖情况,可达成知晓目的语国家社情的基本目标。在此基础上,带领学生剖析作家创作时的社会背景,借助阅读原著了解埃及上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的历史变迁,加深学生对目的语深层文化的认识;引导学生关注与纳吉布·马哈福兹同时期的中国作家巴金及其著作,做到有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教育,再针对性地训练学生使用阿语描述中国文化,提升他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和家国情怀。最后,通过对比纳吉布·马哈福兹与巴金各自的“三部曲”著作,让学生在深刻把握中阿文化异同点的同时,加深他们对文化交流互鉴必要性的认识。

另一方面,阿语教师可通过建立精读课与其他专业课之间的联系,弥补现有精读教材文化内容在培养学生跨文化思辨能力上的不足,通过设置共同议题或思政背景加强课程联系,丰富塑造学生价值观的课程渠道,提升阿语精读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第一,可贴合社会实际设置相同或相似议题。以第三册第五课《双刃剑》(سلاح ذو حدين)为例,该课主题为“事物具有双面性”,实际可承载诸多值得讨论的现实话题。在2019年外研社多语种“教学之星”大赛阿语组冠军授课视频中,获奖的精读课教师引出中美贸易战话题,引导学生正确看待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此外,该课还可借助口语课程设计课堂辩论环节,将学生带入辩论情境进行正反两方“交锋”,从思想上启发学生推动国际力量对比向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切实将中国情怀、时代特征与世界眼光统一起来。第二,可结合当前形势设置共同思政背景或语境。思政课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看待,外语人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起着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作用,外语课程更应置于百年变局之大背景中(习近平,2021:6)。以第三册第八课《中阿关系史一瞥》(لمحة عن تاريخ العلاقات الصينية العربية)为例,该课以汉朝张骞出使西域作为内容导入,概括了古丝绸之路上的中阿关系发展及双边交往历史。阿语教研室可尝试以精读课内容为主线,组织本专业不同课程教师集体备课,立足百年变局,综合不同课程教学任务进行内容引申。比如,让学生通过阿拉伯简史课了解中阿关系发展历程,通过阿拉伯国情课深入理解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应对;在阿语写作课或口语课上可将“阿拉伯国家是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作为命题,启发学生从不同方面论述阿拉伯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意义,实现将中国特色道路、制度、文化成果转换为国际社会能够听得懂且易于接受的中国故事的教学目标与思政效果。

致谢:感谢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张红玲教授提供宝贵意见。

参考文献:

- Almujaiwel, S. 2018. Analysing Culture and Interculture in Saudi EFL Textbooks: A Corpus Linguistic Approach[J].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2): 31-43.
- Brooks, N. 1968. Teaching Culture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J].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3): 204-217.
- Byram, M., V. Esarte-Sarries & S. Taylor. 1991. *Investigating Cultural Studies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 Book for Teachers*[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Cortazzi, M. & L. Jin. 1999. Cultural Mirrors: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the EFL Classroom[G]//E. Hinkel. *Culture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aves, K. 2019. Recent Books on Language Materials Development and Analysis [J]. *ELT Journal* (3): 337-354.
- Liu, K. 2016. Prioritizing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Cultural Contents in EFL Textbooks Through AHP[J]. *Journal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5): 841-850.
- Samovar, L. A., R. E. Porter & L. A. Stefani. 2000.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3rd Ed.)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爱德华·霍尔. 1991. 无声的语言[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陈法春. 2020. 外语类本科专业课程思政内容体系构建[J]. 外语电化教学(6): 12-16.
- 国少华. 2011. 教材编写与教学实践——以《新编阿拉伯语》[M]//国少华选集.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教育部. 2020.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EB/OL]. [2023-12-15].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 康莉, 徐锦芬. 2018. 大学英语教材中的文化自觉及其实现[J]. 外语学刊(4): 70-75.
- 刘艳红, Zhang, L. & S. May. 2015. 基于国家级规划大学英语教材语料库的教材文化研究[J]. 外语界(6): 85-93.

- 牛新生. 2002. 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J].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6): 80-83.
- 潘亚玲. 2016. 跨文化能力内涵与培养——以高校外语专业大学生为例[M]. 北京: 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 孙有中. 2017. 人文英语教育论[J]. 外语教学与研究(6): 859-870.
- 孙有中. 2020. 课程思政视角下的高校外语教材设计[J]. 外语电化教学(6): 46-51.
- 孙有中, 王卓. 2021. 与时俱进, 开拓中国外语教育创新发展路径——孙有中教授访谈录[J]. 山东外语教学(4): 3-12.
- 王会花, 施卫萍. 2021. 外语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践路径探析[J]. 外语界(6): 38-45.
- 文秋芳. 2021. 大学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和实施框架[J]. 中国外语(2): 47-52.
- 习近平. 2018. 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N]. 人民日报, 07-11(002).
- 习近平. 2021.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 新长征(党建版)(3): 4-13.
- 肖琼, 黄国文. 2020. 关于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思考[J]. 中国外语(5): 1+10-14.
- 徐锦芬. 2021. 高校英语课程教学素材的思政内容建设研究[J]. 外语界(2): 18-24.
- 杨言洪, 王晓宇. 2018. 中国与中东“语言互通”贸易价值研究与人才培养启示[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 57-65.
- 张伟年. 2014. 英语教材评价理论框架研究[J]. 外语研究(1): 67-73.
- 张红玲. 2007. 跨文化外语教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郑晓红. 2018.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教材评价研究——与 Michael Byram 教授的学术对话及其启示[J]. 外语界(2): 80-86.

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Content in College Arabic Intensive Reading Textbook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ANG Xiaoyu

Abstract: Foreign language textbooks serve as a vital medium for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content embedded in textbooks is essential for identifying and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This study employs text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testing methods to examine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in college Arabic intensive reading textbooks, focusing on three dimensions: cultural themes, cultural levels, and national attributes. The findings assess the feasibility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Arabic intensive reading courses through the existing textbooks. Drawing on concrete teaching examples, the study puts forwar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utilizing current textbooks to ex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aterials, thereby enhancing the achievement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bjectives in Arabic language courses.

Key words: intensive textbooks; cultural content;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abic language teaching

责任编辑: 朱晓云